



## 试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兼与康晓光先生商榷(刘东超)

(2005-5-12 10:36:47)

作者：刘东超

正如一个国家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建设需要认真研究和长期规划一样，意识形态方面的建设也需要理性的审视、系统的设计，这是当代民族国家有必要具备的清醒意识之一。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存在着时大时小、或隐或显、若即若离的各种问题和危机。对此，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何新就曾指出：“我认为我国现有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其内容和形式上看，都确有与新时期相脱节，不能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路线相适应的问题”。在新的世纪到来之后康晓光又有些极端地表述为：“明明是推行资本主义的权威主义政府，却宣称自己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而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共戴天，民主主义要消灭权威主义，中国政府就是这样天天宣扬要消灭自己所作所为的理论。”最近，罗成琰又谈到：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使主流意识形态被冲击、被淡化的倾向越来越突出。再加上一些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缺乏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当代现实、回答当代问题的勇气和自觉性，也缺乏与当代各种思想学术体系对话、交流并论争的热情与魄力，不能真切地解读民间的文化生存和生活诉求，空话、套话盛行，思想和表达显得苍白无力与枯燥乏味。这样，也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有所降低。”从这三位立场观点和思想资源差异甚大的论者的表述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矛盾重重、形势严峻，亟须深入研究和根本变革。正是基于对此的清醒意识，在新世纪我国相对宽松的政治和言论环境中，一些学者对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许多论述。坦率地说，有一些论述由于内容的陈旧、观点的平庸而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但也有些论述表现出某些新颖奇特之处，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和思考。在此，我愿意选择康晓光先生近年的一些论述为例来进行一些讨论，并在此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方案思路。

### 一 意识形态的基本规定和前提条件

此处当然不必过多地阐述意识形态的概念，因为中外学界的考察已经相当详细了。我们基本上是在如下意义的中性色彩（不含褒贬）下使用：为一个国家政权进行合法性和正当性论证和辩护的思想学说，与此相联系，它当然也具备整合社会、凝聚人心、规范生活的作用。因此，它具有相当清晰的两层功能，一层是支持政权，一层是条理社会。也正是由于这两层功能的规定，这套思想学说必须在相当程度上为国家和社会接受。缺乏前者的接受，它最多只能是某种民间思想而不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缺乏后者的接受，它对国家的支持功能就会大打折扣，并将最终被废弃。

一套思想学说如果想为国家和社会接受成为意识形态，决定于各种偶然和必然条件。所谓偶然条件指的是它的时空环境与政治势力之间的辐辏缘聚，由于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几乎无法测算的个人、群体及历史、地理等细节因素，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将此归结为历史偶然性。所谓必然条件，在此我们能够考察的主要是思想学说本身的逻辑性和解释力以及它和国家社会之间的关联度。也就是说，这种思想学说在逻辑上应该比较自恰和深密，能够较好地解释人们的生存感知，尤其是国家感知、国际感知及历史感知，并在这种感知中得到对国家和社会的支持意愿。当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相当清楚，偶然条件和必然条件不可能完全分开，而是相当紧密地混合在一起的。我们在此的区分仅仅是出于认识和论述的方便。而且，在不同时代和国家条件下，它们之间还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游移现象。也可以说，它们之间的联接地带一般相当宽阔且多有变迁、模糊之处。

具体到当代中国，一种具有成为意识形态抱负的思想学说毫无疑问也必须满足上面的两层条件。由于偶然条件不易（并非绝对不能）从思辩的角度予以把握，我们在此处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必然条件上。首先，在数千年文明史的基础上，又加上近现代以来对西学的大规模引入，使我国民众和学界的思想能力达到了一个较为可观的境界。在此，我们仅简单地将其表现表述为两点：一是理性能力有了较大提高，无论是同晚清（更不用说以前了）相比，还是同民国甚至改革开放以前相比，我国普通百姓和学界处理现实事物和理论课题的逻辑思维能力增强甚多。只要比较一下那时的学术著作和今天同类学术著作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当然，并非没有特例存在。在我看来，史学、佛学研究中在某些方面大约就有特例。）二是公正、自由、民主等普世观念成为广大人民的基本理念，成为他们分析问题、感知生活的基本出发点和测量标尺。这些理念的被接受自然有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中最为关键、最为深入的时段应该

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五年。在当代中国，具有意识形态抱负的思想学说必须接受民众和学界思想能力和基本理念的检验，其理论品质和思想主旨必须符合民众和学界的基本要求。这是意识形态建设中理论层面的必然条件。其次，当代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帜下，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地在华夏大地上铺展了改革开放的历史画卷。对于这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历史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判断和评估，我则将之理解为“中国当代”这一最为晚近的历史时段。之所以进行这一断代划分，是因为只有在这一时段上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化才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大规模、深层次地展开。此前中国近现代的一百余年（鸦片战争以来）可以看作是这一阶段的准备阶段，此后相当一段时间（至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或完成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也可以看作这一时段的继续。在考察意识形态问题时，这一阶段最值得注意的三点是：市场经济的步步推进、全球化进程的渐渐融入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坚持。毫无疑问的是，从这二十五年不长不短的历史来看，这三点都有各自的历史必要性和现实价值，而从可以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来看，它们都还在以各种方式展现和释放着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意识形态建设时必须面对的现实因素，它们构成了社会现实层面的必然条件。也就是说，具有意识形态抱负的思想学说必须有效回应这三者的理论和现实挑战，处理好与这三者的关系，才可能使其抱负得以实现。总结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必然面对的理论 and 现实两层必然条件，可以说对具有意识形态抱负的思想学说提出自身资质建设和处理现实问题能力两个方面相当高的要求。如不能达到这一要求却具备这一抱负，有可能成为历史的闹剧、丑角或短暂现象，而中西古今并不乏这样的先例。当然，我们也应该充分估计到，历史的偶然性既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甚至根本改变这样的要求。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第 4 页\]](#)

[\[第 5 页\]](#)

[\[关闭窗口\]](#)